

历史短波

刘伯承:下定决心学俄语

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35岁的刘伯承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来到苏联,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刘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却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刘伯承从此坚定了要学好俄语的信念。

梁启超:折杏花被父教育

梁启超家教很严。小时候,他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看到主人家院子里的杏树蓓蕾初绽,便悄悄折下放进袖笼里。对孩子甚严的梁父当场便以出楹联方式不动声色地教育了梁启超——“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听到梁父出的上联,梁启超恍然大悟,羞赧地对下了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我国突破氢弹技术的背后

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大国功勋》,记载了多位科技大家鲜为人知的多彩人生和奋斗精神,现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钱三强的殷殷嘱托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冒雪来到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所(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里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与国家命运相连

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

氢弹研究,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从那一天起,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我国科研人员重担在肩。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上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的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地进行理论探索。

一次核试验前的讨论

会上,压力、紧张充斥整个屋子。这时,只听到“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敏和陈能宽两位科学家忽然你一句我一句地将诸葛亮的《出师表》背诵到底。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都真切体会到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用隐语打电话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作密集的报告,寻找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

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里,一个又

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

一天,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新奇地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余玮

陈赓为何看不上顾顺章

顾顺章在叛变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务委员会成员,具体分管中央特科。顾顺章虽有他对敌斗争坚决果断的一面,却又有其专横跋扈、居功自傲的一面。陈赓虽然与顾顺章一起工作,一起干着党的政治保卫工作但“对他十分看不惯”。

陈赓的儿子陈知建曾说:“我父亲是正规军校毕业生,参加革命以后,经过多次考验,信念、理想很坚定。顾顺章不是,他是拉帮结派,用他手下的一帮打手,老是喜欢搞一些极端的个人恐怖行动。这一帮人心狠手辣,特别愿意和那些流氓团伙青洪帮交往,完全不像共产党。我父亲对党内同志多次说道:‘顾顺章的世界观不对和我们不对路。我们只要不死,就会看到他叛变。’”

“红队”是中共的武装力量,顾顺章来者不拒、招降纳叛,大肆收罗黑道上的亡命之徒。有一次,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与另一家戏院老板常春恒火拼,请顾顺章出场,顾顺章带领部下帮顾竹轩打死了常春恒。

顾顺章本人还腐化堕落嫖妓吸毒。周恩来要他悬崖勒马,说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党人的道德准则。他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背着周恩来依然挥金如土,醉生梦死。

顾顺章认为,是党需要他而不是他需要党,所有很狂妄。他的口

头禅就是:“中央的任何大事,都不能没有我顾顺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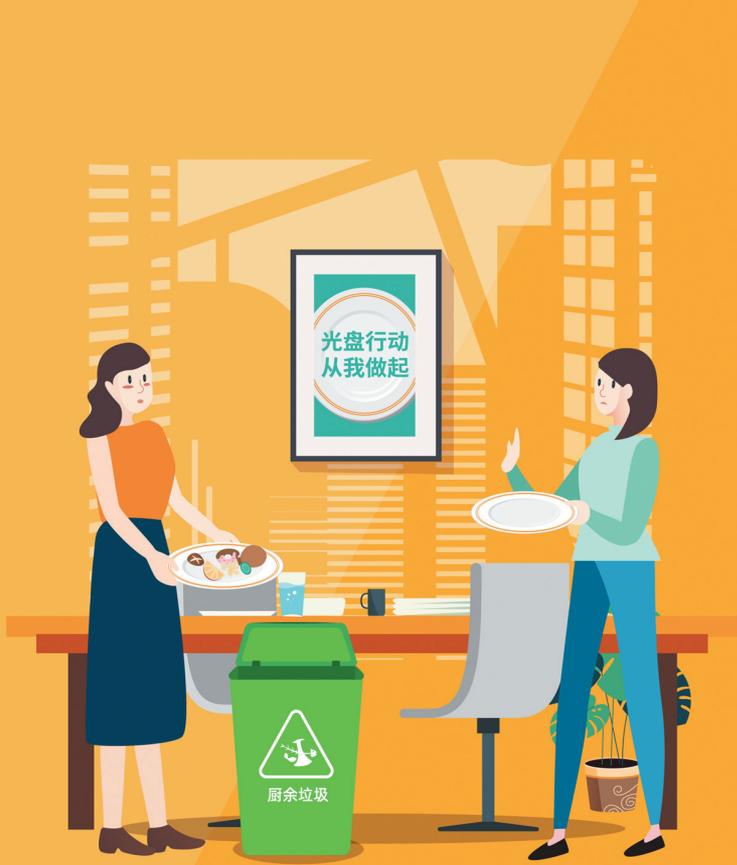
鉴于他的狂妄,组织上一边调整中央特科内部的人员结构,一边将聂荣臻派到顾顺章的身边。聂荣臻说:“调我到特科的意图是,为了从政治上加强特科。中央发现顾顺章把这些特科工作的掩护手段变为追求个人享受的目的,日益腐化堕落,引起党的警惕……他在党内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之后,趾高气扬,胡作非为。当时还没有想到他会叛变,只是感到,如果放任他这样下去会出问题。调我来就是为了约束他的放荡行为。”

顾顺章觉察到了组织的用意,很不高兴,百般刁难聂荣臻,给他穿小鞋。明明知道聂荣臻从国外回来,没有隐蔽斗争经验,又不熟悉上海的社情民意,顾顺章还是要派他出去除叛徒,让他随时面临掉入敌人圈套的危险。幸运的是,聂荣臻靠着自己的机智,逢凶化吉,每一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本人毫发无损。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说:“顾顺章本来也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他应该带着他的战友去消灭那些与人民为敌的魔鬼。结果却是同流合污,他自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变成了魔鬼。”

顾顺章叛变后,一度受到重用。1935年,他被国民党处决。沈尧伊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公益广告



光盘行动

青岛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